

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党务干部

●赵景军

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机关党建工作面临诸多新任务、新情况和新课题。作为从事机关党务工作的同志,其政治定力、学习动力、工作能力和创造活力,直接关系到党建工作的推进落实及最终成效。笔者以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务干部,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讲政治,主动站位。一是坚定站稳政治立场。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始终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始终做到坚决拥护核心、坚决听从核心、坚决维护核心,始终做到经常看齐、主动看齐、全面看齐。通过自觉增强“四个意识”,时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切实履行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对此,党务干部要有深刻理解和由衷认同。要真正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对党组织应该有归属感,对自身角色应该有光荣感,对本职工作应该有使命感,自觉担起政治责任,恪尽职守,勤勉敬业,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三是始终保持政治热情。同行政业务工作相比,党务工作可能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不是那么看得见摸得着,但这并不代表党务工作不重要。相反,只有真正把党务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才能为本部门、本单位的整体工作注入强大动力、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机关党务工作者对自身的岗位职责应当时刻保持政治热情、始终充满工作激情,在党建工作舞台上创造突

出业绩、展示更大作为。

第二,要重学习,完善自我。一是要精研业务。对党建理论、党务知识等方面内容必须深入学、系统学、持续学。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要反复研读,务求内化于心、融会贯通。二是要博览群书。不仅要精研党建理论,同时还要广泛涉猎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知识,不断丰富思想内涵,开阔眼界思路,提高分析、研究、处理实际问题和工作的能力水平,进而把党务工作做得更出色、更出彩。三是要学思结合。要坚持问题导向,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通过学习解疑释惑、补齐“短板”。特别是要深入研究近年来市直机关包括外地一些好经验、好做法,从中找到带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借鉴吸收,为我所用。

第三,要争一流,倾力作为。一是着眼大局深谋划。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市六次党代会精神这条主线,牢牢抓住推进“四项重点工作”这个核心,着力做好“三篇文章”,即做好提升共识、凝心聚力的文章,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做好营造氛围、助推助力的文章,结合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事上见、撸起袖子加油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市直机关兴起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快发展的热潮;做好深度融合、协调推进的文章,找准部门行政业务工作与全市中心工作的契合点,发挥优势、选准载体、注重实效、形成特色。二是突出重点善统筹。当前,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可以说是机关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围绕这一“主课题”,结合“党员学习日活动”“建功白城十三五、服务发展当先

锋”及创建“红旗党支部”“党员干部进社区”等方面工作,在整合上开动脑筋,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做到抓重点带整体、牵一发动全身。三是与时俱进谋创新。要在增强吸引力、感召力上谋创新,开展活动、推动工作要增强服务意识、力求深入人心;在体现特色、打造品牌上谋创新,坚持主流引领,积极探索“机关党建+”的思维模式,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着力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机关党建品牌;在丰富手段、多措并举上谋创新,坚持原则性、突出灵活性、注重实效性,创新工作思路,讲求方式方法,努力使机关党建工作既富有生气、又充满活力。

第四,要善协调,凝聚合力。重点应处理好“四个关系”:一要处理好与部门领导的关系。要摆正位置,注意讲究工作方法,经常向领导汇报工作,提出工作设想,阐明工作思路,争得领导的理解、认同与支持。二要处理好与同志的关系。要富有亲和力,乐于沟通、善于沟通、勤于沟通,真诚倾听大家的心声,充分吸纳意见建议,集众人之智、举团队之力,共同做好机关党建工作。三要处理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市直各部门党务干部在工作中要注意加强联系,相互学习切磋,交流借鉴好经验、好做法,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四要处理好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各部门党务干部要经常与市直机关工委保持联系,及时反映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作为市直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机关,机关工委将坚持领导与服务并重、督察与指导齐抓、工委与基层共进,帮助基层广泛协调解决难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机关党建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环境。

(作者系中共白城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众所关心的突出问题,如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住房、上学、就业、医疗等民生问题,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分配制度,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等。只有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何以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不可能崛起。如果说,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外在面貌,那么文化繁荣则孕育了一个民族的脊梁风骨。而核心价值观又是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社会就缺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缺乏凝神聚力的思想共识,一个民族就缺乏有力的精神支撑。在当下,在各种价值观的激荡与碰撞中,有些人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理想,眼里只有个人利益没有集体利益,只有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有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强筋壮骨”,防止精神缺陷,确立起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基本道德规范,汇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据《广西日报》)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已经出发,而且每一步都迈得如此坚定和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美丽中国的自然基础。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新高度,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战略谋划和战术实施阶段。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标志着生态文明从概念到行动的转变。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奠定了行为准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力与生产力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的重要论断,实现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统一。“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这种内在统一观最有力的证明。“绿色发展”理念的确立则是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统一的理论升华,从理论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未来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奠定了行为准则。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是坚定的,承诺是郑庄重严的。在国际舞台上,2015年习近平主席带着满满的政治诚意和大道担当,远赴法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并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张和责任。2015年6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2015年12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向全国人民承诺: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坚定信念,不仅体现在理论创新和经济建设目标上,更重要的是已经把理论 and 目标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不仅用理论创新回答了“做什么”,而且用法律、法规和制度回到了“如何做”的时代课题。

首先,新修订并于201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环境保护法》,被誉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充分体现了立法理念、责任主体、监管模式、环境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等的创新。新法实施第一年,各地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34%。

其次,为了进一步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基础,国家出台了“1+6”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制度体系,提出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再次,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启动是“绿色发展”由概念到行动的重大举措,标志着财富观由以物质财富为中心向以绿色财富为中心的根本转变、追求财富的方式由单一的自然索取型向自然投资型转变、经济增长由资源依附的数量扩张型向幸福型经济转变,全方位立体式探索与生态文明建设想关联的、相互匹配、可复制的生态化政府、生态化生产方式、生态化消费方式、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的公民意识等制度安排。

最后,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从理论创新到环境保护法修订、到“1+6”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立、到生态文明试验区再到针对特定生态系统的制度创新,构成了系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必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据《光明日报》)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王朝科

领悟共产党员快乐的真谛

●陈思炳

廖俊波在许多人的眼中,几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他依然认为自己很快乐,“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他真正把工作当成了一种爱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毕生追求的快乐的事业。”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生前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很少休息,同事们劝他“不要太累了”,他总是精神振奋地说:“我不累,工作是快乐的哟!”

廖俊波的回答,道出了快乐的真谛:工作是快乐的源泉。何谓快乐?快乐当然与物质有关,更与精神相连。许多事实证明,一个人倘若没有精神追求,即便成为物质财富上的富翁,也会因为“富了口袋,穷了脑袋”而成为精神上的贫民,唯有真正的快乐。工作,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是人物质生活的第一需要,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是人精神生活的第一需要。

一个高尚的人所追求的不只是个人的物质享受,更是事业上有成就的精神愉悦。一个天文学工作者,虽然每天和银河、星系打交道,但他并不感觉枯燥无味。一个地质工作者成天奔走在高山、湖海之间,他却热爱祖国的一石一木,苦中自有乐趣。图纸和数据,在一些人看来索然无味,对于机械工程师来说,却是趣味无穷。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将试验杂交水稻的成功,视为最快乐的时刻;航天人把看到一颗颗卫星上天,视为最快乐的时刻;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拿到金牌,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视为最快乐的时刻。正如爱因斯担所说,真正的快乐,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愉快,对事业热心,经过奋斗得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工作是快乐的,还因为自己的工作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工作的最高意义不是索取报酬,而是甘于奉献。幼儿园的阿姨看到“祖国的花朵”在健康成长;辛勤的医生为痛苦的病人解除了病痛;公正的法官为蒙冤者伸张了正义;热情的民警为多年失去音信的老人找到了亲人;诲人不倦的老师看到桃李满天下,个个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他们怎能不感到快乐呢?当焦裕禄看到一棵棵大的泡桐树,谷文昌看到一丛丛繁茂的木麻黄,杨善洲看到一张山葱茂的林海,姜文坤看到一群群肥壮的晴隆羊,廖俊波看到一

张脱贫群众开心的笑脸,他们怎能不感到快乐呢?他们虽然累,但累并快乐着;他们虽然“苦”,但苦中有乐。他们走过的人生路,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一个脚印一支歌!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快乐。廖俊波在许多人的眼中,几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他依然认为自己很快乐,“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他真正把工作当成了一种爱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毕生追求的快乐的事业。”不仅廖俊波是这样,从解放初期的孟泰、王进喜、时传祥,到当代的焦裕禄、郑培民、孔繁森、谷文昌、李国安、李素丽、徐虎、吴天祥、王顺友等,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不都是用自己辛勤工作的汗水,为人民服务,给人民解忧,帮人民排难,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给千百万人送去快乐吗?因此受到人民的爱戴和传颂,他们自己也是社会上最光荣最快乐的人。相反,那些忘宗旨贪图私利的人,那些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的人,那些偷懒耍滑不愿作为的人,那些畏首畏尾不敢担当的人,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那些贪赃枉法损人利己的人,那些“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那些“无利不起早”“出工不出力”的人,那些能力不足还霸占位置的人,醉生梦死生活,浑浑噩噩度日,又有何快乐可言?其结果只能留下千古骂名。

“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这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邹韬奋的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助于我们领悟工作和快乐的真谛。

(据《光明日报》)

扶贫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重在改造贫困文化

●王晓晖

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扶贫措施也应该是多维的。精准扶贫,应建构在能保障持久脱贫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精准扶贫要发挥能人的示范效应,培育一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

扶贫工作不宜简化为项目的实施

扶贫实践往往被简化为项目的实施,甚至被简化为直接给钱给物;同时从内容来看,这些项目的目标往往局限在直接提高收入、改善基础设施之上。这种简化的做法便于扶贫工作推进,但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项目供给与农户需求脱节、多部门难于形成扶贫合力、农户缺乏积极性、易滋生农户“等、靠、要”心理、项目实施绩效差、返贫率高或缺陷。

首先,贫困是一种涉及物质匮乏、能力不足、社会地位低下、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多维现象。相应地,扶贫措施也应该是多维的,除通过各类项目进行经济扶持外,还需有改善医疗、教育、住房、信息接收渠道等的社会安排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其次,经济扶持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即“社会态”之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对经济扶持具有促进或制约作用。如果经济扶持与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态”不相契合,扶贫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会破坏“社会态”。部分地区扶贫资源不公平配置导致的村庄分化和村民关系紧张,扶贫开发造成的贫困人群“等、靠、要”心理都是现实的例证。因此,除通过扶贫项目进行经济扶持外,精准扶贫需引入改善“社会态”和改造贫困文化的视角,建构能保障持久脱贫的社会、文化基础。

构筑精准扶贫的社会基础

精准扶贫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源供给和配置。要保障贫困人群有效利用和分享扶贫资源,就应有相应的机制,也即是所谓的社会基础。结合当前农村地区的扶贫实践,所谓构建精准扶贫的社会基础,就是要增强贫困社区及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建立表达、维护和促进贫困人群利益的机制,建立有助于可持续脱贫的社会兜底政策。

精准扶贫的效果高度依赖贫困人群的能力,而他们之所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力缺失。这是一个悖论,其破解之道就是提升贫困社区及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吸纳多维减贫理念,建构生产和生活性公共服务体系,比如改善饮用水质、加强卫生保健工

作,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等;提供涵盖劳动力流动服务、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技培训和推广、农业生产风险防控和保险等的生产性公共服务。其次,增进村民之间关系的和谐,生产生活的互助。农村社会历来具有高效的互助功能,但市场的入侵、贫富差距扩大、劳动力流动、扶贫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等原因逐渐侵蚀农村社会的机体,故应重建农村的公共性,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恢复农村的互助能力。再次,要把项目的实施与农业技术和手工技能培训结合起来。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不仅决定着项目的成败,更是打开可持续脱贫之门的金钥匙。

精准扶贫是以政府为主要推手的民生工程。政府在筹集扶贫资源和快速实施项目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面对广大农户复杂多样的需求时,面临政绩锦标赛压力的政府往往无力提供细致、耐心的服务,反而倾向推动扶贫资源流向村干部、大户、人等能较好实施扶贫项目的农村精英,导致“精英俘获”和扶贫资源瞄准偏离。要抑制精英俘获和瞄准偏离的现象,需构建社会监督和利益共享机制。首先,政府要转变角色,放弃扶贫项目具体实施者的角色,将项目实施的任务转交给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 and 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自己则专注于监督项目的实施,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服务。其次,通过政府购买扶贫开发服务,引进、支持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共享”理念为指导参与扶贫。再次,将允许贫困群体以土地、资源、扶贫资金入股。

在“两线合一”政策的推动下,“两元”贫困人口、暂不能脱贫的人口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被纳入了兜底扶贫的社会救助之内,由政府直接提供货币和物资救助。这是典型的“收入转支”的扶贫政策。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认为,社会政策设计应促进穷人进行储蓄和投资,进行资产积累。根据他的思想并结合纳入社会救助的人群的实际情况,兜底扶贫政策也需按“分类施策”原则重新设计:只对无力脱贫者提供“收入保护”;对于无业可扶者、暂不能脱贫人口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则应采取有助于资产积累的、增权的社会政策。

有效利用文化资源,努力改造贫困文化

“文化开发”和“文化扶贫”是扶贫工作中两种常见的文化态度。前者认为文化是建筑、服饰、手工艺品、歌舞、仪式、习俗等可开发的资源,贫困的原因是文化主体缺乏开发文化、发展旅游业的市场意识和能力。后者认

为文化是知识水平、科技水平、公共文化设施、生活观念、生活方式,贫困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科学知识缺乏、文化设施匮乏、传统落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两者对贫困的诊断相同,都认为贫困的原因是意识的制约和能力的贫乏,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应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文化,应尊重 and 发挥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尊重他们对生计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权。

首先,理解贫困地区人们的认知、思考和做事的方式。从内外因的关系来看,外部导入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思想等扶贫开发资源能否发挥作用,有赖于激发贫困地区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要调动贫困地区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则需考察贫困人群自己的认知框架,考察他们如何阐释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当前,农村家庭普遍的劳动分工模式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妇女、小孩留守在家,而且农村人深知种植业的绝对收益和比较收益都比较高。之所以积极性不高,是因为缺劳动力和预期收入不高。政府补贴补偿了他们的生产成本,补贴终止则意味着自担成本增大,收益降低甚至亏损,所以补贴终止后,农民即中断生产。这些项目之所以遭遇困境,原因之一就是项目设计者没有与贫困人群进行良好的文化互动。所以,未建立在贫困人群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环境的看法、对发展的看法的基础上的扶贫方略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其次,发掘和利用传统的生计方式。特定生计方式是人们适应生存环境所谋求衣食和居所的整套手段和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适应特定自然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结果。传统的生计方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村民们也能够根据自然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调整其生计方式。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去发现和利用他们生计方式的价值,选择与其传统生计方式契合的扶贫开发项目。

再次,适度控制和改造不适宜的贫困文化。尊重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并不是不加取舍地照单全收他们的文化。依照人类学家奥斯科·刘易斯的观点,贫困文化是持久贫困的人们应对贫困的一套文化态度、信念、价值观和实践。突出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过高的人情消费、宗教消费、节庆消费、祭祀消费,这些传统取向的消费挤占了农户用于改善生计的投入;第二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和扶贫开发造成的“等、靠、要”心理。对于前者,应采取说服教育、政府规范等途径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对于后者,要发挥能人的示范效应,塑造“等、靠、要”可耻的舆论氛围,培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

(据《人民日报》)